

档案文献编纂学概要

国家档案局教育处 编



档案出版社



档案文献编纂学概要

国家档案局教育处 编

档案文献编纂学概要

国家档案局教育处 编

*

档案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马驹桥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625 字数148千字

1987年6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统一书号：7283·102 定价：1.20元

ISBN7-80019-048-X

G·033

编者说明

根据档案专业职务聘任制度的要求,凡是申请档案专业职务而不具备规定学历、又不具备免试条件的档案专业人员,必须经过规定的档案专业课程考试(有的还要考外语或古汉语),合格后才能进行评审和聘任专业职务。档案专业课考试分为两个等级:申请管理员职务者,考中专水平的专业课;申请助理馆员、馆员职务者,考大专水平的专业课。大专水平的专业课规定为五门:档案管理学、科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保护技术学和文书学。申请馆员职务者五门课全考,申请助理馆员职务者考其中的四门。

为了使全国档案专业的考试,能有统一的命题范围和标准,使参加考试的人员有统一的复习参考材料,国家档案局教育处,在参考现有的档案学专业教材和有关著作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上述五门专业课的复习用书,每本书约10万字至15万字,由档案出版社出版,供考试命题单位和复习考试人员参考。

《档案管理学概要》由姚烽编写,《科学技术档案管理学概要》由时元第、于薇编写,《档案文献编纂学概要》由郝存厚、杨伏玲编写,《档案保护技术学概要》由丁文进编写,《文书学概要》由冯伯爵编著。

前 言

档案文献编纂学，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早就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曾由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编有《文献编纂学(初稿)》，1982年出版了丁永奎、曹喜琛同志编著的《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近闻曹喜琛等同志的《档案文献编纂学》又将很快出版。

我们对编纂学可以说知之不多，研究甚少，为了应付当前的急需，我们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作了些近乎“缩微照相”的工作。在“缩微”过程中，我们也参考和引用了其他一些论著，如朱荣基同志的《档案史料概论》，以及其他一些档案界同事们的有关论文。但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引文难免有所误差。特此声明，并致鸣谢！

郝存厚 杨伏玲

1987年1月28日

目 录

第一章 概论	(1)
第一节 档案的特性和档案的社会价值.....	(2)
第二节 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历史演变	(4)
第三节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对象、任务 和编纂工作的基本原则	(17)
第四节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在 档案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20)
第二章 编纂的选题和准备工作	(27)
第一节 档案文献编纂题目的选定	(27)
第二节 编纂档案文献汇编的形式	(36)
第三节 档案文献编纂的准备工作	(38)
第三章 档案文献的查找和挑选	(46)
第一节 查找档案文献的原则和方法	(46)
第二节 档案文献的挑选	(53)
第四章 档案史料的加工	(72)
第一节 档案史料的加工原则	(72)
第二节 档案史料加工的范围和方法	(75)
第五章 档案文献的标题	(91)
第一节 单份档案文献标题的结构和标法	(91)
第二节 档案文献的组合标题	(101)
第三节 档案文献原有标题的处理	(104)

第四节	拟制档案文献标题的基本要求	(105)
第六章	汇编内档案文献的编排	(112)
第一节	汇编的体例	(112)
第二节	档案文献的分类排列	(119)
第七章	汇编评述性材料的编写	(128)
第一节	注释	(128)
第二节	按语	(148)
第八章	汇编查考性材料的编写	(154)
第一节	年表	(154)
第二节	插图	(162)
第三节	备考	(164)
第九章	目录和索引的编制	(169)
第一节	目录	(169)
第二节	索引	(174)
第十章	汇编的序言和编辑说明	(186)
第一节	序言	(186)
第二节	编辑说明	(201)

第一章 概 论

档案文献编纂学，是史科学或文献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史料从广义上讲，包括人类实践活动所形成和遗存的一切记载，主要有文字的、实物的和口传的等。因此，有人认为史科学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研究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可称为史科学通论；另一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可称为具体的史科学”。^①这种分类是否科学，尚待研究。但是史料所含范围之广，当今史科学各分支学科之互相交错和繁茂则是事实。再以文献学而言，何为文献，古今学者各有所见，众说纷纭，大凡以文字记载者为是，则少非议。如此，文献的种类自然也很繁多，诸如文件、档案、图书、报刊、家乘、谱牒等文字记录和照片、影片、录音、录象等声象记录均属其类。

档案既属史料，更属文献之一种，因此就具有上述其他文献所共有的特性。但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自身的个性。档案文献编纂学是专门研究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与方法的科学科目。但是，笔者认为，不论是史科学还是文献学所研究的问题，都不是彼此孤立或能截然分开的，它们既不可避免地共同遵循与应用一般史料或文献编纂的原理和原则，同时又必然相互汲取其成果，促进自身的不断发展，这就是笔者使用档案文献这一概念的意义。

^① 《中国古代史史科学·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第一节 档案的特性和档案的社会价值

档案是一定的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实践活动所直接形成的并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电报、图纸、簿册、著作手稿、书信、日记以及声象材料等各种历史记录。由此可以看出，档案区别于其他史料和文献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档案具有原始性。所谓直接形成的，是指档案在产生和形成过程中主要是以处理和记载某一事务为目的而采取的一种行为和手段，或者谓之第一意识。而图书资料等则是以档案为母体的一种变异形态。从这个意义讲，档案就具有人们通常所说第一手史料的特点。二是在形态上档案具有记录性。它不同于文物的实物性。尽管有些文物，诸如铭文、碑文也具有记录性，但在当时无疑也是档案的一种转载和再生形态，只是由于其原生档案佚失而作为档案的补充而已。三是档案不同于现行文书。所谓历史记录，就是指已经办理完毕，保存下来以备查考或作为证据的文件，才能转为档案。由此可知，档案的原始性、记录性是档案固有的基本属性和特点，因而就决定了档案所独有的最可靠性和历史回溯性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它对于工作查考、经验总结、科学历史研究、生产建设、技术交流等各方面都具有凭证或参考的作用。这已为古今中外学者所论述，并已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特别是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档案的作用尤为显著。在我国，自西汉司马迁、东汉班固利用大量历史档案、资料撰写了《史记》、《汉书》两大巨著之后，历代史家无不利用历史档案撰写所谓一代史书的正史。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极为重视

在科学研究中对历史档案的利用。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

“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①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从他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他在撰写《资本论》这部巨著时，经过仔细研究和作过摘录的档案文献就达一千五百多种。马克思能够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剖析，创立剩余价值学说，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必亡，社会主义制度必胜的科学论断，除了他的科学世界观以外，详细地占有档案文献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列宁在撰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时，也曾广泛地利用了各种历史档案文献，从而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作出了科学的说明。

我们的党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制定路线和方针政策等一系列的伟大决策过程中，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并一再强调占有客观材料对动员教育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巨大意义。早在1931年战火纷乱的年代，党中央就制定了《文件处置办法》，其中规定：“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为了教育广大干部掌握斗争的规律，1941年毛泽东同志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是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收集材料的工作不可。”^②同年毛泽东同志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49页。

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做到这样，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①建国后，党和国家不仅对历史档案的搜集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从而为保护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而且随着档案信息资源的不断开发，档案的社会价值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大量事例说明，档案无论是在历史研究领域、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还是在开展政治斗争、行政决策，乃至解决民间纠纷等过程中，均发挥了日渐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已成为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和不断取得新成果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据。同时，档案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上也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只有详细地、全面地占有档案文献，才能克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才能揭示历史的真象，也才能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并用以指导开拓和创新的实践活动。

综观上述，我们可认识到加强档案文献编纂学建设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第二节 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历史演变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从孔子编订“六经”算起，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这一活动为历代相因，连绵不断，

^①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59页。

其规模之巨大，成果之繁富，是世界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由于我国古代掌管档案、图书以及史学研究的长期兼溶不分，故而不可能产生有关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专门著述，档案文献编纂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确有一些学者、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在他们从事文献整理、编纂和历史研究中，把对目录学、校勘学、历史编纂学与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熔为一炉，对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和方法进行过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料，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这一历史遗产，进行认真的发掘和整理。目前，我们对这一领域尚处于初步探索，仅略述其梗概，以窥一斑。

一、孔子编订“六经”及其编纂思想

我国有史可考的最早进行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是春秋时代孔子编订“六经”。所谓“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先王政典也”^①。又说：“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以其出于官守，而皆为宪章，故述而无所作。”^②可见“六经”是孔子利用档案进行整理编纂而成的，是档案文献汇编性质的史料书。其中《尚书》是第一部典型的档案史料汇编。孔子进行这种编纂活动，是有其目的的。因为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正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当时孔子出于对社会改革的不满和抵制，曾周游列国，游说其维护奴隶制的政治主张；由于到处碰壁，遂改变主意，转而从事古代档案文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② 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六艺》。

献的整理与编纂，通过兴办教育的途径，以所编“六经”为教本，传播其思想和主张，达到其“拨乱世反之正”^①的政治目的。尽管这一目的不可能实现，然而孔子的这一活动对于普及教育，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以及整理流传古代档案文献，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都在客观上起到了历史开创性的作用。

孔子编订“六经”所遵循的原则，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②就是说，他编订“六经”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故国文献，《诗》、《书》、《礼》、《易》大都是档案文献汇编，《春秋》虽属编述性的作品，但基本上是依时序排比史实，属于大事记的性质，并尽可能保持原有的文字。他认为把事实照录下来，要比自己宣发议论深切明白得多。正因如此，“六经”才被看作是研究历史的可靠史料。

第二，“子不语怪、力、乱、神”。^③即对文献中有关怪异、勇力、叛乱、神鬼之类记载，一概删除。这反映了他维护奴隶制统治的反动消极思想，但也存在着积极的因素。

第三，“攻（治）乎异端，斯害也已”。^④就是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论说，删除自认为有害的见解。这从孔子的阶级立场和观点来说，并不为怪。这也说明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目的和要求，但是完全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排除一切对立的材料，并不可取。

① 《史记·孔子世家》。

② 《论语·述而》。

③ 《论语·述而》。

④ 《论语·为政》。

第四，“多闻阙疑”，^①“勿忘、勿必、勿固、勿我”。^②就是要求多听、多看，对有疑问的地方加以保留，不妄行校改。在进行必要的校改时，则应采取不臆测、不武断、不固执、不主观的态度。这是孔子推崇的科学治学态度。

孔子倡导的上述编纂史料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虽然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总的说来，仍为我国历史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开创了科学的原则，自古迄今为历代治学严谨的学者所推崇和借鉴。

二、《资治通鉴》与司马光的史料编纂思想

司马光主持编修的《资治通鉴》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极负盛名的历史巨著。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它与《史记》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史学的“双璧”。

《资治通鉴》的思想性虽不及《史记》，但在编修方面很有特点。前人称：“其书网络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③，“别择最称精美”，“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④，尤其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纂上更有独到之处。其中包含有许多重要的档案史料编纂学的思想。

第一，史著撰写与史料编纂的紧密结合。

我国历史撰著的传统做法，一般是借助史料编纂成果来撰著史书。例如司马迁写《史记》，就利用了其父司马谈所整理编写的大量史料，同时还利用了包括《尚书》在内的其他

① 《论语·为政》。

② 《论语·子算》。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47。

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文献汇编。而把史书撰著和史料编纂直接结合起来的，首推司马光。

《通鉴》的编修程序大体分为三步。先作丛目，次作长编，最后删削定稿成为《通鉴》正文。

丛目，即先以《实录》为主，参照其他史料，将重要史实列出纲目，按年月日顺序排列，称为事目；然后广泛收罗史料，在各条事目之下注明全部档案史料的出处，丛目实际上是一种附有史料索引的提纲。长编是依据丛目的规范和指引，将事目下附注的全部史料，斟酌详略，比较异同，决定取舍，然后抄录下来加以排列，成为长编的正文。同时，在正文下注明异说，并说明取舍的理由。显而易见，长编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汇编。

应当指出的是，在编纂长编的过程中，编者在史料的考订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凡某事并见于诸家记载，均须认真比较异同，验明正误，并将考证结果和去取的理由在正文之下用小字证明。《通鉴》成书之际，司马光等又将长编中的这些注释文字汇集成专帙，由此产生了《通鉴》的一部羽翼之作——《通鉴考异》。修史的同时自撰《考异》，这是司马光的又一创例。

章学诚曾断言：“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①司马光却早已卓然一身将三者兼而举之：长编为“比次之书”，《通鉴》为“独断之学”，《通鉴考异》为“考索之功”。司马光把史料编纂与史书撰著高度紧密结合起来的办法，对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把古代“编辑之学”推向了

① 《文史通义·答客问中》。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长编的编纂原则与方法。

1. 丛目未成，不可遽然作长编。这是司马光首先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如前所述，丛目包括事目与附注两部分，事目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重要史实的纲目，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选材提纲”。附注是在各该事目下对全部有关史料所作的著录，相当于现在所谓史料索引。事目从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上对选材提出要求，起着限定的作用，附注则对查找史料起着指引作用。司马光尤其看重丛目的附注部分，要求附注务须全备，即全面查阅史料，尽量将每一事目的有关记载网罗无遗，他再三强调“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这与我们现在要求查找史料必须遵循“宁多勿漏”的原则是一致的。

2. 择善而从，兼收并蓄。这是司马光在史料鉴别选用方面提出的原则要求之一。史料查找收集齐全后，有关同一史实的记载往往众说纷纭，详略不一，真伪杂揉，如何取舍，首先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此其一；“彼此互相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此其二；“若彼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史实者修入正文”，此其三。简言之，所谓择善，包括辨别真伪，考证异同，比较详略，删繁就简，校订文字诸端。其次兼收并蓄，即对那些年月事迹不合的记载，以及其他异辞或说，不能弃而不顾，而应通过注释的形式加以保留。注释的具体方法是“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以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

3. “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这是司马光关于史料鉴别选用的又一重要思想。其实质在于注意史料内容，而不囿于其形式。他还对一些史料取舍作了具体说明：“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乃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诫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

司马光敢于正视官修《实录》、正史之不足，指出其不可尽据，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注意旁取杂收，广泛取证，这也是司马光超越一般史家之处。

4. 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这是司马光要求编排史料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种编排史料的方法源于《春秋》，是古代史学的传统方法。史料中往往有不具时间或年月日不确者，其采取的办法是：“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其年之下。”这不仅是对传统方法的继承，而且有所发展，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足资借鉴的。

5. “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这是长编取材的一个总的的基本原则，也是最为人所称道的一个原则，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重要史料的遗漏，删削有所余地。

司马光的史料编纂思想在我国史料编纂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其内容丰富而深邃，对提高当前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水平弥足珍贵。我们应当进一步挖掘，并给以全面的总结和批判的继承。